

# 曲高和众 百家争鸣

## ——读《红楼梦百家汇评本》

唐富龄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 唐富龄(1932-),男,湖南益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834-03

最近,我读了由陈文新、王炜纂辑的《红楼梦百家汇评本》(2005年6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觉得这是一部既有利于《红楼梦》阅读的普及与提高,也能为科研、教学工作提供诸多方便的具有特色的读本。由此,我联想到了一个“曲高和寡”还是“曲高和众”的问题。

无论从何种标准来定等级,《红楼梦》无疑是阳春白雪的上乘之作,但它绝不是“曲高和寡”式的作品,而是“其曲弥高”而其和弥众的不朽之作。人们在接受这样一部“看似寻常实奇崛”的伟大作品的过程中,永远是读无止境,研无止境;永远存在群众性阅读的普及提高和科研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及二者之间互相促进的问题;与此相关,也永远存在“曲高和众”的声浪是否必然一浪高过一浪的问题。这不禁使我想起《昭明文选》中宋玉《对楚王问》的故事: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欤?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篱之晏鸟,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鲤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鬣于碣石,暮宿孟诸,夫尺泽之鲋,岂能与之量海水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众所周知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以及“曲高和寡”的成语典故都出自这里,而且被广泛延伸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种习以为常的褒贬符号。该文是否为宋玉作,学界存疑,这里只是就文论文。文中宋玉对楚襄王的质疑所作的辩护,充分表现了他的才气与论辩力,“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论断,也不乏合理因素。但如果视之为律条,将其绝对化,甚至反推出“和寡”者必“曲高”或“和众”者必“曲低”的结论,那就大谬不然了。比如,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语言朴质生动,有的甚至明白如话,全“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沈德潜《说诗碎语》),然其意象含蕴却有一种难以企及的清新深婉之美,被公认为一代诗歌精品。将这种“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的诗视为曲高和众之作,应该不算牵强。又如白居易的诗,总是追求妇孺能懂的艺术效果,谁又能说它属“下里巴人”,而不是“曲高和众”之作呢?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创作实践及其传播过程,更是对宋玉式理论的挑战。

《红楼梦》的受众有两种:一是群众性的一般读者,一是过去的文人学士和现在的科研教学人员。如果不是由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吸引了上述人群的阅读,而他们又在阅读中去研究它、推崇它和宣传它,《红楼梦》的艺术能量就失去了释放对象,曹雪芹付出的“不寻常的”的“十年辛苦”,最终只能是“一场空”。受众中的两部分人,他们一方面在阅读中各自与文本构成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之间也存在一种互补式的互动关系,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就是读者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衡定过程,同时也是它实现其固有艺术价值的过程。

一般来说,群众性的阅读,就整体而言,它是一种智慧源泉最丰富的品鉴;而就个体而言,囿囿而过和看热闹的情况

远多于掩卷而思和看门道的情况。文人学士和科研教学人员出于个人兴趣和职业责任,多致力于以其学养和鉴赏能力去做释疑解惑、开掘内蕴、揭示艺术成就等方面的工作。这种研究,只要不是过于自闭在象牙塔中,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群众性阅读的普及与提高,同时他们也能从群众性的鉴赏中吸取智慧与灵感,有利于拓展科研教学工作的视野与针对性。只要简短回顾一下《红楼梦》由手抄本阶段的争相传阅,到高鹗、程伟元以活字排版120回本的印行,再到后来各种印行本的不断出现及其盛况连连的过程,同时相应回顾对《红楼梦》的评论由最早的脂评到后来的评点派、考证派以及各阶段的文本派的评论,其队伍越来越大、评论越来越多的过程,就不难看出,群众性的阅读与文人们的评论基本上是呈正相关的对应状态。群众性的阅读热情往往有利于激发评论的跟进,而评论的跟进,又有利于激起人们更大的阅读兴趣,如此互相促进,永无止境。而在红学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更应自觉地推进这种双向性的互促互动,以使《红楼梦》的艺术价值被最大化的开掘出来。陈文新、王炜焚膏继晷、反复勘比选辑而成的《红楼梦百家汇评本》就是一个能在这方面发挥很好作用、并具有鲜明特色的《红楼梦》评点本。

首先,它选入的资料广而精。《红楼梦》研究涉及的面实在太宽,硕果累累,数不胜数。要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评论比较全面地介绍给读者,若选材过严过窄,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若过于兼收并蓄,势必篇幅难容,进退失据,故于宽收中又要注意精选。正是从这种实际出发,本书入选评家130余人,节录评论1300来条,约20万字左右。这些评论,涉及问题十分广泛,收录资料大都属于精要部分。虽然所收资料限于1949年以前,但其所涉足的研究领域大都具有后续性,不少评论,今天看来,仍很精辟。后来者的研究,虽然在整体上必然超过前人,但前人们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及其所具有的时代特色,是红学发展史上珍贵而不可或缺的一页。选辑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盘存那时的家底,避免科研中无效的重复劳动,并从中获得启发,以便更好地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继续前进。

其次,选材不拘一格,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本书评论的选辑,正如《前言》指出的那样,它“不受选辑者个人学术偏好的限制,而以是否精彩,是否具有代表性为标准”。正是从这一标准出发,辑选者尽量将各方面问题中有代表性的意见搜罗起来,择其精华,不避歧异,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纳诸家之言、成争鸣之局的百花齐放式的汇评本。以评家而言,它选录了百余人各式各样的观点,其中较多地选用了脂砚斋、王希廉、陈其泰、哈斯宝、二知道人等评论文字较多、又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业界公认的人有代表性的评语。对于像王昆仑、俞平伯等影响很大的评论家的论述,因其著作至今仍在印行,容易找到,故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少量选用,以便将篇幅用于选录其他罕见评论者的评语。以内容而言,各大流派如索隐派、考证派以及文本派中的各种观点都在入选之列。诸凡生活素材与作品描写的关系、作品的结构特点、主题思想、作品的政治思想倾向、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续书评价、人物性格及其褒贬、传统继承、表现技法、细节描写乃至于天足问题、刺绣技艺等方面的各种意见,都尽量杂采纷呈地收集起来,以备考论。

再次,编排有特点,便于对话。本书所辑资料,不同于一般资料汇编的分类编排或按时序编排,而是将原文与评语分为左右两栏,以回为基本单位,评论随文本内容定位,尽量使二者处于互相对应的位置。即使因栏位的固定性和所引评语长短的不固定性而出现二者错位的情况,也很容易在同一回中上下梭动找出相应评语。这种版式,对科研教学工作者来说,检索极为方便,可减少许多寻找资料之劳。对一般读者来说,有此汇评本在手,既可与文本直接对话,又可在需要释疑解惑和讨论问题的时候,与诸多评论对话,以提高欣赏水平。比如,第13回写贾珍对儿媳妇秦可卿之死,表现出一种反常的痛苦与伤心,对他的这种失态,不仅书中人物感到纳罕,读者也顿生疑窦,但只要读读评论栏中所引靖本及王希廉、陈其泰等人的有关批语,便不难知道隐藏在这种诛心之笔后面的用意所在了。从这一角度看,汇评本确是有益于普及与提高的好读本。

还应该提出的是,本书洋洋两万余字的前言,写得有新意、有特色、有深度。它不仅注意给一般读者提供基本的导读信息,而且就若干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报告了自己的科研见解。其中对有的问题的阐述,观点鲜明,言简意赅,点到为止。如对后40回作者问题的看法。对有些问题的论述,则笔墨恣肆,议论纵横,独抒己见。如“《红楼梦》对人情小说传统的扬弃与超越”一节。对这一研究课题虽已有人涉足,但“前言”所选择的切入角度及深度,它所得出的结论及其论证过程都颇新鲜别致而又切中肯綮,使人不能不在会心一笑中予以认同。比如,它对贾雨村一生升沉荣辱的历史考察入手,开掘其中含蕴,有理有据地论证了《红楼梦》是如何颠覆了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书的问题。又以贾雨村与娇杏那段“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的故事入手议论开去,说明《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那套路数是如何从诸多方面加以解构的。这种善于从文本自身的叙述中抓住问题症结和具有特色的论证,体现在对艳情小说批判性的分析,对《红楼梦》是怎样在扬弃中将《金瓶梅》的写实与才子佳人小说的诗意追求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使二者有机融合,以拓展自己独特领域的分析等等,都是款款道来,渐入佳境,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红楼梦》第二回中借冷子兴之口发表的那番所谓应运而生、应劫而生和正邪禀赋的议论,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作者对人性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人生命运与社会兴衰关系的哲理性思考。《红楼梦》中提及的许多重要人物,从广泛意义上说

也大都难离其馥。因此,这段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文字也往往为人们所关注,成为研究对象之一。“前言”在“贾宝玉的谱系归属”一节中,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典型解剖。它从那段议论中提出的一系列受正邪二气之赋影响而来到人世的人们中,避开许多似与贾宝玉有更大可比性的人物,单挑出李后主、唐明皇和宋徽宗三位皇帝来与贾宝玉作同谱系的典型分析,乍看似觉有点唐突,细思则感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它抓住了正邪二气所赋的要害,摸清了贾宝玉与三位皇帝之间最基本的人性特点及其渊源关系,揭示了这种看似地位相去甚远实则感情的某些基本点上相通相近的源流关系,比之用其他人来作对比的参照,更有利于帮助人们理解贾宝玉深层次的性格因素。

李后主等三位皇帝由于沉溺个人享受,荒废朝政,任用奸邪,导致了生灵涂炭,国运飘摇,乃至国破家亡的结局,因而为天下骂,为天下笑,这是适得其宜的。然而,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面而复杂的,没有绝对的黑与白和好与坏,帝王将相也不例外。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历史的硝烟逐渐稀释以至归于沉寂的时候,人们再从远距离的视野中全方位地追溯他们的一生,就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从文化、文学或爱情等角度对之作强化审视,更加强调自己需要认可和运用的方面,忽视或淡化他们一生中曾是更重要的方面。于是,李后主在词史上的地位凸显出来了,成了吟咏“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令人赞赏同情而又成就很高的感伤词人。也许,不少人只是在追问他为什么能写出如此超逸绝伦、哀思凄婉的作品的时候,才想起他曾戴过的皇冠及其“一旦归为臣虏……垂泪对宫娥”的难堪遭际。唐明皇的前期仍不失为有道之君,后期惑于声色,致使大权旁落,国事日非,酿成安史之乱,连爱妃性命也无法庇荫保全。但当文学家根据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将这一历史题材摄入视野以后,重心明显地偏移了。无论是《长恨歌》还是《长生殿》,虽对唐明皇的贪色误国有所批判,但其倾注感情所歌颂的还是他和杨贵妃之间那种“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以至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爱情经典之作。至于宋徽宗的昏庸误国,被虏北去,客死异域,已为历史学家及一些文学作品反复宣判,人所共知。不过,他好收藏、善书画、喜文艺的一面,也常为后人记起,甚至于将其列为这方面的名家而给以定位,这也是自然的事。

在曹雪芹的大框架分类法中,李后主等既无资格与那些“应运而生”的“大仁”者相提并论,也非“应劫而生”的“大恶”者之流,于是只有把他们归入受正、邪二气所赋而来的那路人中。而在《红楼梦》中最宜归入这类既有“聪明灵秀之气”,又有“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的人物圈中的首选者,无疑是贾宝玉。“前言”翔实地论述了贾宝玉在文化素养和情爱观等方面是如何承接了同一谱系中前辈人物的风范,又以其在特定环境中的独特生活方式和独异言行而成为有别于前者的“这一个”的有关情况。并进而指出,《红楼梦》将贾宝玉纳入这一人物谱系,“并以之作为小说主角,这是对人情小说传统的一个重大超越”,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世情书的面貌”。这种追本溯源、高屋建瓴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红楼梦》是怎样打破传统写法和开拓人情小说新局面,认识贾宝玉形象的文化底蕴是很有启发的。当然,从贾宝玉在这一人物谱系中的地位来看,他不只是以个性化的特征延续其前辈的人文传统,而且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这种传统,试探性地轻叩着某种新质的大门。“前言”对贾宝玉谱系的研究,也可视为人们探索这一形象是否包孕新质问题的起点,值得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 何坤翁)